

这事,很想说与你听

严国庆

岳父母换房,原住的那处经了中介,找到意向买家。商谈几次,双方如愿,便腾房过户交接。买者是对青年夫妻,孩子等着就近上学,很快就启动入住的一些事。我爱人参与了岳父母卖房的过程。事过一些日,对方告知房子里发现剩物,其中有许多相片、信件和影碟。说是青年夫妻收拾房间时,从一些橱柜和抽屉深处取出来的;他们以为这些东西不好扔掉,就一一收起、装入袋,之后亲手送到中介这边,让我爱人取回来。

拿到袋子,岳父母才想起来历年保存的这些“档案”。“他们不说,我们也真记不起这些东西塞哪里了。”岳父母年过八旬,这话倒也是事实。他们现在记得最真切的,也许就是降压药什么的放在哪。

这当中很多东西我们也是头一次见。一起翻出来看,之中无论照片、影碟还信件,记录的是岳父母与儿孙的天伦之趣,留住的是岳父二十年的军营青春以及岳母携女儿们随军的日子,记下的是他后来转业地方、行走于山水田野的过往时光。尤让岳父欢喜的,是他与岳母来到韶山,给毛主席旧居献花、立于领袖雕塑前拍摄的影像。今年七一又添一图片,是岳父接受“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瞬间。他把这幅留念照轻轻放入袋子里,感慨过往如昨;意思是,想想过去,是回忆,看看这些,有回味。而青年夫妻这样细心地分辨剩物,替他们收管好岁月沉淀的珍贵,让岳父母又多了回味。他们嘱咐我爱人,一定打个电话说谢谢。

看看岳父母的神情,看着眼前的袋子,我们就觉得它装的不只是看得见的那些东西了。青年夫妻有行无言的那种好,似乎也装在了里边。后来家人们在岳父母那里团聚,还会提起。犹如窗前、门外的阳光,来去默不作声,却会让人牵挂和念叨。

生活琐琐碎碎。陌生的他人偶然相逢,事过境渐远。因为一些事,却常让我们蓦然感到他人分明亦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也意识到,与陌生人之间,有时会相互影响和改变。不论日子怎么变、变得怎么“网”打尽,还是得与未知的近近远远的人们互通互联、互相依存。刚好读到西班牙哲学家费尔南多·萨瓦特尔的沉思录《教育的价值》:“谁都不会生活在孤独和隔离中,而是永远存在于彼此之间……”人生,不就是相互照应、影响、教育和启发的过程?人类生活有一种意义,便是在这样的过程里头相互传递点什么——就如此时,我想说出来,让你知道。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师友追梦》是老报人吴承惠先生生前最后一本书。书中回忆与老作家秦瘦鸥的多年交往时,谈及1961年,上海作协的魏绍昌先生约他合编“鸳鸯蝴蝶派”小说资料集,由他编下册,选录代表作品的精彩章节,前附故事梗概。书的上册“史料部分”于1962年如期出版,下册则因政治气候突变,延至八十年代初,才完整出齐。在上册书中,秦老即被归于鸳鸯蝴蝶派作家之列,下册自然也选了《秋海棠》的片段,颇引起秦的不满。好在秦瘦鸥倒也大度,他并不怪罪魏、吴两位,说那不过是历史悠久的门户之见,宗派主义所致。

今之普通读者或许听惯了黄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火爆一时的《新鸳鸯蝴蝶梦》,歌中唱道:“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但鸳鸯蝴蝶派文学究竟是啥劳什子,想必并不了然。其实这个概念也很难用一两句话来简单概括,影响最大的许是鲁迅先生在1931年的一次演讲中,将上海洋场才子们创作的旧派文学一律冠以“新才子佳人小说”之名,又称“鸳鸯蝴蝶式文学”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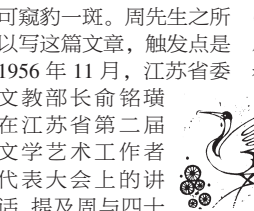
有趣的是,秦瘦鸥也因写了相关的文章,得罪过前辈作家包天笑。时在1960年7月20日,秦先生以“宁远”笔名撰有《关于鸳鸯蝴蝶派》一文,刊于

香港《大公报》。文中称“鸳鸯蝴蝶派亦称礼拜六派”,其地盘除了许多杂志,还包括《申报·自由谈》《新闻报·快活林》。又说这一派的作品,“最大的缺点是脱离现实,流于无病呻吟,所写大多空中楼阁,不能反映真实的生活”。篇末谈及鸳鸯派作家中有不少人兼作翻译,即以包天笑为例,称他翻译过不少教育小说,如《馨儿就学记》,对读者起过一定的好作用。

包天笑当时已寓居于香港铜锣湾保良局附近的一处高级住宅,读及此文,很快写下《我与鸳鸯蝴蝶派》作出回应,七天后文章见报。他一上来先感谢秦氏为自己辩护的话,即从风格上看,包天笑“倒还不是道地的鸳鸯蝴蝶派”。接着夫子自道,谈他怎么开始写小说,随后笔锋一转,称“至于《礼拜六》,我从未投过稿。徐枕亚直至到他死,未识其人”,并称自己的小说,没有一部是属于鸳鸯派的。行文至此已是绵里藏针,对于自己被称为鸳鸯蝴蝶派中人,抱有强烈抵触心理,予以坚决否认。文末,包的态度有所缓和,说苏州星楼街由范烟桥、程小青、姚苏凤、郑逸梅诸君组织,“他们是否鸳鸯蝴蝶派,我无庸为他们辩白”。看来是不置可否,一语带过了。

周瘦鹃对此如何表态?倒也留有文字记录。读其《闲话(礼拜六)》一文,可窥豹一斑。周先生之所以写这篇文章,触发点是1956年11月,江苏省委文教部长俞铭璜在江苏省第二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提及周与四十年前的刊物《礼拜六》的关系,并褒扬说那些作品很有趣。于是接此话头,先是坦承自己为“礼拜六派”中的一员,又将自己与鸳鸯派中人分隔开来,称“至于鸳鸯蝴蝶派和写四六句的骈俪文章的,那是以《玉梨魂》出名的徐枕亚一派,礼拜六派倒是写不来的”。文末也指出己之不足,即《礼拜六》全体作者包括周在内,“对于旧社会各方面

的黑暗,只知暴露,而不知斗争,只有叫喊,而没有行动”,因此在文艺领域中,得不到较高的评价。看似调门不高,倒也有理有据。至于严独鹤有何高见?可从其哲嗣严祖佑的一篇回忆文章中看出一些端倪。当时祖佑先生正读大学,他读到一本魏绍昌的鸳鸯派资料汇编(案,即1962年上海文艺版《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书后罗列该派作者和作品目录,“几乎除了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以新月社为代表的那些曾留学欧美的作家以外,把文坛上九流三教、良莠不齐的各路散兵游勇全部一网打尽”。当他把这份名录递给父亲看时,老先生淡然一笑道:“将写言情小说的徐枕亚和写武侠小说的郑证因拉在一起,说到底,这个派也就不存在了。”诚哉斯言。当一个概念的外延变得无远弗届,其内涵也就所剩无几了。



参加社区“侨友”读书会一次活动,耄耋之年的王阿婆谈起她当初亲自参与帮助归国华侨日籍妻子扫盲的往事……



上世纪50年代,沪北郊野空地被开发,一批工人住宅拔地而起,2000单元,每单元可住10户(一楼5户,二楼5户)。此处附近彼时尚存养牛场、金鱼场,还有一片农田。新建的甘泉新村是那时居住条件相当好的工人新村之一,房间高大宽敞,视野开阔,空气清新。当时不少旅居海外的华侨携带家眷回国热情投入新中国建设事业。甘泉新村有一幢住宅楼上5居室全部分配给了从日本回返中国的华侨,这5户人家的男主人在距此不远的江宁路

上上周四是第四个中国医师节。在那个特殊的节日,我不由又想起多年来一直思考的这个问题:做医生,职业幸福感,是从哪里来的?

医学,是为“人”而设,是“人”学。身躯四肢、五脏六腑、眼耳鼻舌、骨骼肌肉、大脑脊髓、九大系统、两大循环,再加上微观层面上各种门类的细胞等等,医学,可以说是所有科学中跟“人”打交道最为全面深刻、最为细致入微的学科。而人文是人类文化中的核心,是诗书礼乐化成天下。医学人文,是从人文角度对医学的思考和总结。著名卫生法学家徐青松教授总结了医学人文精神的三要素:即人本、仁爱 and 公益。

“人本”即“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体现在医患双方。医生怀抱奉献的“医心”,依其专业知识及经验,提供医学诊断、预后、治疗选择及结果等信息,患者提供其本身对健康照顾的目标,其中所蕴含的更重要的价值是现代医学的主旨精神,即“人文关怀”。于患者,重要的是信任医生,从具丰富经验的医生专家那里获得治疗意见,认清治疗的方向,满怀希望;于医者,重要的是打破沟通的藩篱,在医治疾疾的同时,鼓励患者释放紧张,放下负担,战胜恐惧,即“身心同治”。

“仁爱”即“仁者爱人”。医学是“人学”,“医道”归根结底自然也当是“人道”。而“人道”的核心则是“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能够“爱人”者,其本人必须首先是个“仁者”,拥有一颗仁慈的“爱

的黑暗,只知暴露,而不知斗争,只有叫喊,而没有行动”,因此在文艺领域中,得不到较高的评价。看似调门不高,倒也有理有据。

至于严独鹤有何高见?可从其哲嗣严祖佑的一篇回忆文章中看出一些端倪。当时祖佑先生正读大学,他读到一本魏绍昌的鸳鸯派资料汇编(案,即1962年上海文艺版《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书后罗列该派作者和作品目录,“几乎除了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以新月社为代表的那些曾留学欧美的作家以外,把文坛上九流三教、良莠不齐的各路散兵游勇全部一网打尽”。当他把这份名录递给父亲看时,老先生淡然一笑道:“将写言情小说的徐枕亚和写武侠小说的郑证因拉在一起,说到底,这个派也就不存在了。”诚哉斯言。当一个概念的外延变得无远弗届,其内涵也就所剩无几了。

参加社区“侨友”读书会一次活动,耄耋之年的王阿婆谈起她当初亲自参与帮助归国华侨日籍妻子扫盲的往事……



参加社区“侨友”读书会一次活动,耄耋之年的王阿婆谈起她当初亲自参与帮助归国华侨日籍妻子扫盲的往事……

心”。这体现在医生对病人的善心、同情心及同理心,“有时比外科的手术刀和药物还要重要”。徐青松教授说,“心的门是从里向外开的”,敞开心门,表达爱,投入情感,替患者着想,考虑患者之病痛可能会影响到其家人以及造成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这就是在行医中融入了人文精神,是当今医学模式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必然发展。

“人道主义”。医生做公益是另一种的“治病救人”和“仁爱情怀”。医者要牢记并时时提醒自己,“我不是在治疗一个病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生命的人。”公益实践多种多样,做好事、行善举、义诊义教、救济捐赠、帮助弱势群体等,其中科普医学知识也是一种公益,科普写作往往结合医学人文的思考,科普和医学人文结合,旨在创造人类的福祉和利益。

若干年前我在《中国医学人文》杂志征文发表的一等奖作品《君风》,诠释的正是医者人文精神的风范浩气:墨眉善目益师,白衫慈怀良朋。殷言如兰隽永,浩行似竹秀恒。乐业不知春暖,助人那管秋冷。诗云有匪君子,吾歌无疆君风。

人本、仁爱、公益,“三要素”融合,医心、爱心、恒心,“三心”并举,树立医者品德和气质,培养审美情趣和艺术精神,把生命跟时代的崇高责任和人文精神联系在一起——是的,医生的职业幸福,从医学人文精神中来。

近日有一个视频在网上流传:一女子在上海地铁里手机外放,乘客劝阻反遭辱骂;到太平间就没声音了。此类新闻近年时见报道,在气愤于某些人的行径之余,反过来却也可以看出,公共场所应该“没声音”已渐成社会共识。去年12月1日《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正式实施,写明禁止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这里想说一点似乎很少人注意到的事实。

若干年前,无论是地铁还是公交,车厢里经常“闹哄哄”,噪声源倒非来自乘客,而是来自移动电视。有些喇叭开得极响,坐在下面是一种如坐针毡的体验(当时有些公交司机还会播放音乐、广播等),对于上下班休息一下的乘客,真是“我太难了”。这实际上构成了“声音污染”。而不知不觉中,这种现象在近年已消失,如今移动电视基本已静音。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此举似乎也低调,但却引人点赞,从中可见管理者的文明理念确实有了提升。

与此同时,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尤其是4G、5G技术的发展,从音乐、游戏升级到短视频,外放也越来越“方便”了。有意思的是,印象中过去外放的多是老年人,他们因为历史原因,公共文明意识似乎相对较弱;如今观察可见,中年、青年人有此行为者,数量绝对不亚于老年人。换言之,这是一种普遍的精神文明发展跟不上物质文明发展的现象。

既然“在公共场所保持安静”已是舆论公认的当代文明规范,那么就应该有进一步的措施来保障。目前,如上海地铁虽有守则,但守则不具备直接的法律制约作用,有人认为应设置处罚法规。是否合适,有待立法方面的探讨。犹记,同样是若干年前,几乎每列地铁都会有走“节”串“厢”的乞讨现象,而如今早已销声匿迹;那么同样,若干年后,每列车厢都将是安静而优雅的,对此,我非常乐观。

排在上。王阿婆当初初中毕业,18岁成婚,在家操持家务。20多岁时,她积极响应“解放妇女劳动力”号召,在夫君大力支持下毅然投入扫盲运动。她和另外几个持有中学或小学毕业证书的青年女同胞,齐心协力教“文盲”识字。在“甘泉一小”夜校学习的,除了这5个日本妇女之外,还有人住甘泉新村的本族同胞。她们很快学会了汉语注音符号,先后按照“扫盲”标准成功摘掉了“(汉字)文盲”帽子。

这场大规模扫盲运动,始于50年代初,止于50年代末。完成使命后,王阿婆她们继续“解放妇女劳动力”,进厂工作了。

无声,是一种文明

老田



听旅友说起沙漠露营,天命之年的我也想去体验个中野趣,五一节,带着装备从江南来到大西北的腾格里沙漠。一望无际的沙漠有诗情画意也有跋涉艰苦,遇到高高的沙丘,登山杖撑着深一脚浅一脚身子像陷在沙窝;艳阳高照沙海粉彩耀眼,热得人汗流浹背喘不过气来。第一天12公里到达伊木其格营地,一屁股坐在地上,累!晚上星星针刺般亮,第一次亲手搭的帐篷有型的。夜幕下一顶顶帐篷映出橘红色手电暖光,赏心悦目。小我好几岁的云朵和我同帐。云朵很兴奋,沙漠里没有信号不能刷手机,她就开心地和我聊天。直到她困了,我开始了脑子里的天马行空,想起旅游过的撒哈拉沙漠,那是享受型的水电空调信号一应俱全,而眼下真正的帐篷露营沙漠过夜,远离任何喧嚣,让我享受了属于自己的时光!

第二天18公里的路程实在吓人,但是沙漠深处湖泊、丘陵、平原等原始地貌,无与伦比地美。昼夜温差大,云朵睡熟时我被缕缕冰凉惊醒,想来今夜身下加了一层垫怎会寒冷?少顷发现近我这头的帐篷门拉链没拉严实。关上门,心无旁骛,看篷顶想过往云烟,被时间放逐的草毡灰线好像也变活了。退休以后还能身灵腿轻享受徒步的快乐,我是生活的幸运人。

第三天10公里属于尾声,鉴于还要去云南大山助学走访,为了保存体力,我奔走搭车。因为眷恋沙漠帐篷,凭着前两天的操练,我独自搭好帐篷,炽情洋溢躺着等候部队。一会儿我又忍不住走出帐篷观看沙漠蜥蜴、甲壳虫还有飞鸟。风来沙响,风沙拍打帐篷像小舟在海里轻晃,沙漠扎营,白天和黑夜一样别致。当终于有了信号的时候,手机里鼎沸人声满屏图文,目不暇接。哎,难忘的沙漠宿营!

许德华



摄影